

文学

会消亡吗

Wen Xue Hui Xiao Wang Ma Wen Xue Hui Xiao Wang Ma Wen Xue Hui Xiao

——学术前沿沉思录

◎ 杜书瀛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序一

老杜又要出书了，就想到我这个读者——他的一系列书的老读者，并且要我写下读后感。我乐于遵命。因为我一直喜欢杜书瀛教授的著作，他的著作内容新鲜，有求真创新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有平易近人之格，无拒人千里之调；有诙谐幽默之趣，无枯燥乏味之论；读来痛快淋漓，读来有益身心健康。这本书把他的著作个性更推进一步，读来令人神往。此话怎讲？让我细细道来。

杜书瀛教授虽年过花甲，但其童心不老，思想绝不保守。他所关注的问题，诚如书名所言，无一不是对“学术前沿”问题的“沉思”。像上编“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这是当前文艺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它要追问的是当下的电子媒介时代文学会不会消亡的问题。此问题产生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欧美，2000年秋，美国著名学者J. 希利斯·米勒教授来北京参加“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一个长篇发言，说全球化时代（或者说电信技术时代、电子媒介时代）文学将要面临“终结”的“悲惨”命运。这个发言后来以《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为题，发表在2001年第1期《文学评论》上。不久即纷纷攘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心和争论。连我也被拉进争论的漩涡中，先后发表过几篇文章。我一直认为这可不是小事，是一件大事。如果文学真的要消亡的话，那么中国搞文学的人（包括搞创作的、搞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少说也有几十万人），岂不要失业了吗？这如今饭碗是第一位的事情，不是闹着玩儿的。杜书瀛教授也热切地持久地关注这个问题，他把米勒发言前前后后的各方面的研究情况，作了细致的梳理和评论，不论是谁的文章，经他的考察研究，娓娓道来，并以他的慧眼，既能看出其精彩之处，又能指出其不足之处，然后把问题一步步引向深入，最后才拿出自己的看法来。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杜书瀛教授的结论之一，认为电子媒介时代的确给文学带来巨大的变化，他把米勒所说的“民族独立国家自治权力的衰落或者说减弱、新的电子社区或者说网上社区的出现和发展、可能出现的将会导致感知经验变异的全新的人类感受”给文学带来的巨大影响——作了充分的合情合理的描述和分析，这些都是具有现实感的。杜书瀛教授的结论之二是：“不管图像怎么冲击，电子





媒介怎么冲击，但是文学还是会存在。文学不死的一个最有力的根据是，事实上它仍然健康地活着。童庆炳教授说，文学经典本身的那种‘味外之旨’、‘韵外之致’，那种丰富性和多重意义，那种独有的审美场域，依靠图像是永远无法接近的。这话很对。……文学是用文字阅读唤起你在头脑中的想象，叫你自己去建立那种审美形象，这要比可视的、可听的形象更丰富。它调动了你的主观能动性。……语言文字提供出来的这种形象，这种作品，这种文本，需要你自己通过创造性的思想和想象来建立形象，这种内视审美是老天爷赋予文学的，是影视所缺少的。就此而言，文学要比影视、比其他图像艺术优越得多。”杜书瀛教授的这种文学在“变中不死”的理论，难道不是有求真创新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吗？

杜书瀛在此书中关注并予以深刻研究的问题还有中国 20 世纪文艺学学术史问题、美学学术史问题，这些都是前沿问题。因为在一个世纪结束之际，新的世纪开始之初，难道不应该对刚过去的一个世纪的学术作一次有深度有意义的总结吗？因为，我们建设新时代的文艺学新形态、美学新形态，都不是凭空开始。按照杜书瀛教授的意见，在进行新的建设的时候，我们必须面对四个问题：“一是面对现实，研究现实的新发展、新特点、新需要”；“二是要面对传统，向传统寻求资源”；“三是吸收世界各民族有价值的文艺学思想”；“四是梳理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特别是百年以来文艺学的研究脉络、研究历程和研究成果，总结经验教训，弄清前人已经做了些什么，根据当前现实的要求，我们在前人已经作过的基础上还应该和能够做些什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犹如生育和抚养一个婴儿，主要和最好是依靠母乳喂养，母乳营养最丰富，最便于吸收消化。母乳，就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我感到这些看法都是非常好的。例如第一点，就关系到我们建设今天新的文艺学是否需要从中国当下的遭遇到的问题出发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的一些学者总是不顾中国自身的问题，生硬搬用西方的一些新理论，来剪裁我们所面临的现实，结果除了多了几个新的名词之外，丝毫也没有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甚至产生了误导。比如引进了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命题后，有些人就以为我们今天中国已经像西方那样的国家了，可以大讲消费主义，因此满足人的欲望，似乎就是我们“新的美学原则”了。第二、第三点我觉得也说得对。第四点我认为说得尤其对。百年来，我们的学术前辈不是吃干饭不干活的，他们作了很多的研究工作，提出了许多中国的问题，并作出了中国式的回答，他们的理论创造实际上形成了区别于古代传统的新的传统，如果我们不弄清楚他们已经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贡献了什么，我们又怎么能知道我们如何“接着说”呢？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杜书瀛教授主持并出色完



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点项目”，首次在国内出版了具有系统性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共四部、五本），为中国学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此外，本书的下编实际上也是百年美学学术史的缩写，许多见解都值得称道。特别要指出的是，杜书瀛教授在总结以往美学研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价值论美学的构想。他是宽容的，认为本体论的美学、认识论的美学都还可以继续搞下去，不要排斥任何有意义的研究，但同时认为价值论的美学是更符合时代的需要的，他说：“目前是价值论美学相对‘走红’的时代。”他就此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例如对于审美价值，他认为：“在审美活动中，一方面主体对客体进行改造、创造、突进，使对象打上人的印记，成为人化的对象，即赋予对象以人的意义，以人文的社会—文化的意义；另一方面客体又向主体渗透、转化，使主体成为对象化了的主体，成为对象化了的主体。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对象化了，对象人化了。当对象成为人化的对象、人成为对象化的人时，审美价值也就诞生了。人化的对象就是审美客体，对象化的人就是审美主体，审美客体对于审美主体所具有的人的（人文的社会—文化的）意义，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广义的美，这种美是一种价值形态，我们称之为审美价值。”这种见解不但有根据的、通达的，而且是新鲜的、具有启发性的。实际上，杜书瀛教授已经勾勒出了价值论美学的整体框架，为美学开辟了一条具有时代感的新路。正是基于上面这些阅读感受，我才肯定地说：杜书瀛此书“有求真创新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

杜书瀛这部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有平易近人之格，无拒人千里之调”。杜书瀛站得高，看得远，但他在评述问题的时候，在发表自己意见的时候，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低调”，没有盛气凌人，没有剑拔弩张，没有疾言厉色，没有个人成见，没有强加于人。他用一种平常心去对待权威，同意就同意，不同意就不同意；也同时用这种平常心对待尚没有多少权威的年轻的作者，好处说好，不足处说不足。特别喜欢引用年轻人的言之成理的论点，而且对待年轻的学者的论文、著作和论点，采取一种谦虚的、尊重和保护的态度，如果这不是发自内心的感情，就是装也装不出来的。这一点，可以说是文如其人。我心目中的老杜，其为人是谦虚、谨慎、随和、宽容和坦诚的，人如此，书亦如此。他的书“平易近人”的另一个原因，可能与他的理论文体有关。杜书瀛教授的书是好读的，尤其是这本书，可能因为多半是在各个高校的演讲整理而成，通篇口语化，没有名词概念的轰炸，没有欧化式的长句子，没有“高深莫名”的纯理论；有的是顺手拿来的具体有趣的例子，有的是个人经历中深刻的体验，有的是深入浅出的论证，所以虽然讲的是深刻理论，却能以通俗的言语，娓娓道来，细



细说来，问答自如，入情入理，来龙去脉，在在可寻。

杜书瀛教授的新著有幽默诙谐之趣，无枯燥乏味之论。新著所论不少地方都很“形而上”，却由于作者善于举例，风趣盎然，化抽象为具体，化理性为感性，化深为浅，化难为易。更有的地方，把自己身边的琐事，融入理论的解说中，读起来就觉得如听相声，幽默有之，诙谐也有之，我想老杜讲到此等地方一定洋洋得意，并博得满堂掌声。例如，讲到电子媒介的发展对人的感受的影响，老杜就说：“说到电子媒介、电信技术王国时代改变人的感受方式、感情方式，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大家看小说《红楼梦》，或者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探春远嫁那一幕是很凄惨的。生离死别，撕心裂肺。远嫁三千里，在几百年前，的确意味着此生难以再见。现在，我的女儿远嫁美国，有几个三千里？比当年探春嫁的远多了，而且隔着一个浩瀚的太平洋。然而现在我们根本没有生离死别、撕心裂肺的感觉。我们和远在美国的女儿除了一两天就发一次电子邮件（瞬间就可以有一个来回）之外，全家每个礼拜都通一次电话。那电话是可视的，虽然目前效果还不理想，技术水平还没达标，不像电视上看到的画面那样清晰和灵活活——我们的可视电话画面有时候像木偶一样，动作比较慢，而且声音也总是滞后一点。但是我能看到小外孙、看到我女儿的表情、动作，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就像面对面说话一样。一见面，两岁多的小外孙就向你问好，家里所有的人都问到：爷爷好！奶奶好！舅舅好！阿姨好！拜拜的时候也是：爷爷拜拜、奶奶拜拜、舅舅拜拜、阿姨拜拜。而且他能够给你飞吻，这多可爱啊！就好像千万里之外大洋彼岸的距离没有了。当然不是绝对没有，但是距离确实一下子拉近了。”这幽默这诙谐，能不让人忍俊不住地大笑起来吗？这段话要是从马季嘴里说出来，那肯定是抖了一个大“包袱”。一种理论讲到这种艺术化的境界，如果作者自己不是完全地消化，彻头彻尾、撒里撒外地弄明白了，是不可能这样有趣地表达出来的。所以我说读老杜的书“读来痛快淋漓，读来有益健康”。

我的读后感就写到这里，但并没有写完。我想杜书瀛新著的读者会继续写的。我的这段读后感先让老杜看看，他要用来作“序”什么的，就不是我的事了。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童庆炳

2005年11月25日



序二

序二

杜老师是“先生”级的人物，这“先生”可不是西语中的那个“先生”，对什么人都能用的。我们中文里的“先生”，字面上虽是早几年而生，但在我们以伦理为社会核心的国度，“先生”就是长辈，就是经验、知识、智慧和由此而来的威严。叫“老师”而不称“先生”，其间的微妙区别是，叫老师似更亲切一些。这两者，杜老师兼而有之。在问学上他认真、严肃、执著，说庄严肃穆都不过分；而当问学及人，他又是那么地欢乐、随和、宽容大度、慈悲为怀。我们这年轻一辈的学人背地里都半玩笑地称他是文艺理论界的“老佛爷”。我以为，仅以这本论著而论，他也担当起这荣誉称号了。

杜老师曾主持过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课题。拜读此书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杜老师本人就是一部当代文艺学学术史。从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到新时期文艺界的各种理论论争，从文艺美学的学科建设到价值论美学的开拓，从20世纪90年代的“思想淡出、学术凸显”，一直到近些年几乎要闹得文艺学界分崩离析的“文学终结论”，本书都有或微观或宏观的介绍，加上其以亲历者的身份，更增添了叙述的真切和体会的人微。纷纭杂沓的当代学术，能讲得如此秩序井然，俨如一知识系统，想想，也惟有咱“老佛爷”杜老师能之。

历史的和事实性的知识建构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本书还洋溢着杜老师内在里一贯独立特行的理论风格。在评述他人研究成果时，一开始总是“你好，你好”的，而后趁人疏忽不备处，猝然一击，即使不致你小命，也打得你生活不能自理。在杜老师那儿，为人的和善绝不妨碍他对自己的执著，对他所认识的真理的执著。这“老佛爷”可不是好惹的。中国人有一个为文的美德，叫“修辞立其诚”。杜老师的“诚”即他的真性情在本书中可谓淋漓尽致。确实，要想不歪曲真理，首先就是不能歪曲自己的真我。

杜老师这一辈的文艺理论家在恢复“审美现代性”上作出了重大贡献。现在如果要对这一历史进程作出一些标记的话，我认为，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论纲，以及钱中义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构成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审美现代性”的三个里程碑。这当然是中国特色的“审美现代性”



了，此处不遑细论。在这一历史阶段，杜老师以其对文学形象理论的建构，对文艺美学学科的开拓，对价值美学的倡导，目前是在电子媒介冲击下对“文学性”的守持，成为中国“审美现代性”理论的一位重要代表。

但是作为“先生”的杜老师并未株守“审美现代性”，因为他是“老佛爷”，所以本书随处可见他对“审美现代性”的反思，对后现代“审美现代性”批判的回应，和在更高一级别上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论争的整合和超越。在文艺学界杜老师这代学者中，对新理论的关注、理解和批判，未有达到本书这个深度的。麦克卢汉在其《理解媒介》一书曾经批评一位老将军对媒介的后果“麻木不仁”，我读到，那位或许是虚构的老将军的言论又真实地出现在我们这儿一位老先生的笔下。做理论虽然是很抽象的活儿，但没有对现实的敏感，那理论一定是不着边际的。这种不着边际，在我们“权”威理论家的著作中，竟频频亮相，真让人看着难过。

1999年，我在听波德里亚的课时，觉得这个农夫样子的老头子就只会危言耸听，一直到去年我还以为他那个“拟像”理论在中国是超前的，可眼下如火如荼的“超女运动”，体育明星由英雄化向娱乐化的大转变，李敖最近在大陆的政治秀，等等，让我陡然意识到，波德里亚那惊世骇俗的预言已经在中国变成现实了。文学，连同文学的神圣，正在被媒介所埋葬。

写到这里，我心中忽然浮起杜老师那“老佛爷”般的“微笑”，这微笑一是对我这般佛头著粪的宽容，而另一方面又似在笑我如此地浅薄。就打住，否则就是继续献丑了。读者比我聪明，他们自然会在充满杜老师微笑的这部著作中读出更多的意义。

杜老师命序，如我小老鼠辈，岂敢岂敢哪，全当给他老人家又交了篇作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金惠敏

2005年11月12日



面对电子媒介的冲击

（自序）

在电子媒介时代（或曰电信技术王国时代、全球化时代等等），文学艺术及整个学术都受到巨大冲击。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更有一个令人吃惊的命题传到中国来：“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文学将要终结”，甚至连哲学、精神分析学也“在劫难逃”（见美国著名学者 J. 希利斯·米勒教授 2000 年秋在北京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似乎文学以及哲学等都将面临灭顶之灾。于是，近几年中国学术界有许多新的学术前沿问题备受关注，并且引起热烈争论，如：电子媒介时代给世界造成怎样的影响？“电信技术王国”使人们在生产方式和内容、生活方式和内容、思维方式和内容、感情方式和内容、感受方式和内容等发生怎样的变化？在全球化面前学术如何发展？文学会不会消亡？“生活审美化、审美生活化”是否导致艺术与生活合一？文艺与生活还有没有边界？文艺学向何处去？等等。

学者们必须关注和研究这些（以及其他相关的）前沿问题，并且作出积极的回答。

正是上述情况，使我对美学界、哲学界、文艺界热切关注的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写了十几篇系列文章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争鸣》、《江西社会科学》、《甘肃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以及其他许多大学学报上发表，并选了十多个相互关联的题目分十三讲，在中山大学、深圳大学、暨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传媒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学院、广西民族学院、惠州大学、佳木斯大学等等，给研究生、大学生作了十几次讲演。这就是这本《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的由来。

我的基本观点是：

“电信技术”、“电子媒介”这个最富有活力和潜力的生产力的大发展，是世界发生巨变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之一，也是引起目前学术发展和变化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当下人类生存境界、审美文化实践以及整个学术活动的内容和样态，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未来的变化还难以预料。

学术要前进，固然必须继承和赓续，但更不能缺少超越和变革，特别是质的超越和变革。



虽然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受到巨大冲击，如电子网络文化带给人们审美感知经验的浅表化、零散化及泛化，可能导致了美学学科结构的改变，审美文化的版图（无论是“面积”还是“结构”）也会发生巨大变化，等等，但文学不会消亡。

既然文学不亡，随之，对文学（以及所有艺术）的领悟、思考和把握也会存在，故文艺学、美学也不会消亡。

文学不亡的根本原因，主要不在外部，而是在文学自身（如其“内视性”等人文本性）。

如何发展文艺学？我提出：应该发展多形态的文艺学——哲学的、政治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美学的、文本的、形式的、历史的、文化的……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协同作战、互补互动。要海纳百川，各不同学派，各分支学科，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21 世纪的中国学者应该敞开胸怀，将古今中外的一切好东西都拿来，以需要为准。从理论的创造、生成及深化角度看，西方的许多最新或比较新的文论和美学思想，在中国学界应得到实质性拓展和创造性转化，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文艺学、美学、文艺美学，必须在承认和研究生活与审美、生活与艺术关系的新变化、新动向的基础上，适应这些变化和动向，作出理论上的调整，对新现象作出新解说，以致不断建立新理论。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一切理论都必须随历史实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随社会现实、审美活动、文学艺术的不断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譬如，目前就急需对审美和艺术的新现象，如网络文艺、广场文艺、狂欢文艺、晚会文艺、广告艺术、包装和装饰艺术、街头舞蹈、杂技艺术、人体艺术、卡拉 OK、电视小说、电视散文、音乐 TV 等，进行理论解说。

我还认为，应该走出以往“学院美学”的狭窄院落，加强美学的“实践”意义和“田野”意义。美学绝不仅仅是“知识追求”或“理性把握”，也绝不能仅仅局限于以往纯文学、纯艺术的“神圣领地”，而应该到审美和艺术所能达到的一切地方去，谋求新意义、新发展、新突破。

此外，我还就电子媒介时代全球化对文艺发展的影响，“价值论转向”与价值美学的前途，人类文化的基本趋向，中国学者提出文艺美学学科对世界学术的贡献，新时期文艺学发展轨迹，等等，进行理论阐发，提出自己的看法。

我深知，我的这些思考是初步的，不成熟的。

我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批评。

杜书瀛

2005 年 3 月 25 日于北京安华桥寓所



目 录

序一	童庆炳 (1)
序二	金惠敏 (1)
面对电子媒介的冲击 (自序)	(1)

上编 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

一、文学会不会消亡	(3)
二、艺术：生活的特异化	(30)
三、文学学向何处去	(55)
四、在全球化面前	(69)

中编 观照文艺学学术史

一、文艺学百年 (上)	(87)
二、文艺学百年 (下)	(107)
三、走向对话的时代	(131)
四、主体性的超越与局限	(149)

下编 美学的沉思

一、我看审美现象 (上)	(171)
二、我看审美现象 (下)	(189)
三、价值美学 (上)	(203)
四、价值美学 (下)	(215)



文学会消亡吗

五、文艺美学诞生在中国	(229)
我这一辈子（代跋）	(251)



上

编

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



一、文学会不会消亡

——在中山大学的讲演

来中山大学讲课，我觉得很光荣，因为这里曾经是鲁迅教过书讲过课的地方。但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许多人不像大学里的老师会讲课。譬如我，就不会讲。不会讲，就瞎白话呗。“白话”，北京话，穷聊、神侃，就是和同学们聊天儿。我带研究生也是以这种方式：聊天。我到广东7天，已经聊了7天了。前几天我在深圳大学跟那里的研究生们聊，又跟我带的香港的博士生聊。后来又回到暨南大学聊，聊完又到惠州学院聊，今天终于聊到了咱们中山大学。内容呢，我想就学术前沿的某些问题，和大家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一些体会。有的想法可能是不着调儿的，有的可能是不成熟的，只是和大家交换意见；有些问题我只把材料摆出来，咱们一起探讨。因为在学术问题上特别是人文学科里，常常很难用“对”“错”来判定，没有一个绝对的“对”，也没有一个绝对的“错”。我们一般应该这么说：这个问题我有自己的看法，另外的同志有他的看法。那么，究竟是谁的看法更符合事物本身呢，那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也许我的看法与别的同志的看法都有道理，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方法不同，路径不同，层面不同，等等。所以，我不太主张在学术中作这样的判断：这是对的，那是错的。我不希望这样。

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

今天聊的话题是文学会不会“消亡”（严格讲应该用“终结”）。

这个问题在中国（不是说国外）是怎样提出来的呢？

本来，提出文学会“消亡”这个问题，中国一般的文学爱好者甚至中国的文学创作界、文学理论界业内人士都感到很突然。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人提出过文学“消亡”的问题。诗经、楚辞、汉赋、魏晋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辉煌。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无以言”。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唐代以诗取士。直到明清，会舞文弄墨、写得一手好文章的人，总是受人推崇、被人



敬仰。那个时候，谁想到文学会“消亡”？

在中国现代，文学也有过不凡业绩。鲁、郭、茅、巴、老、曹……，这些文学大家，谁不尊敬？那个时候也不存在文学“消亡”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文学更是被赋予“崇高”的革命使命。谁敢说文学会“消亡”？

在“文革”以后，文学也曾经有它非常“火”的年代。大家还记得刚刚粉碎“四人帮”的那几年——即20世纪70年代末一直到80年代中期，文学曾经接连不断引起“轰动”，一次接着一次，为全社会所注目，似乎它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作家成为时代的骄子。这个轰动效应大家都还记得。伤痕文学出来了，反响十分强烈，如《班主任》、《伤痕》等一发表，就引起巨大轰动效应，刘心武等人因此一举成名；然后是“反思文学”出现，又是一串串轰动。小说家张一弓啊，谌容啊，王蒙啊，冯骥才啊，张洁啊，蒋子龙啊……，还有报告文学家徐迟啊，刘宾雁啊，理由啊……，你可以说出一长串名字，一长串作家，这里我没法儿一一列举，他们的作品都引起过轰动效应。那时出来一篇小说、一篇报告文学，争相传阅，然后大家议论纷纷。所以那个时候作家是天之骄子。到哪里去，作家，写小说的、写报告文学的、写诗的，很受欢迎，他们总是作为一种英雄的角色（或者被当作英雄人物）出现在各种场合，而且当时在特定的情况底下，他们也确实扮演了这种角色。所以，那时不存在文学会“消亡”的问题。

然而，曾几何时，文学头上的光环慢慢黯淡下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似乎打蔫儿了，作家成了“边缘化”的人物，失去了昔日站在社会舞台中央的英雄光彩。许多作家不习惯：哎呀，过去走到哪里，总是被人们捧着、拥着、伺候着，这会儿我们怎么如此不受待见了？社会聚光灯从他们身上移开了，许多人是适应的。

做文学研究的，就是一些学者，也是这样，也经历了这样一种变化。当文学掀起一个一个轰动效应时，那些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文学研究家也非常受瞩目。比如，刘再复在20世纪80年代写的一本《性格组合论》就曾经很轰动。刘再复是我的朋友。他的《性格组合论》现在看起来也不过是一般的讨论文学理论问题的一本书，如果用现在的标准来看，那本书的许多地方你可能不太满意，有些问题论述得好像还不到位，还应该论述得更好一点儿。但是那本书卖得很好，当年，80年代中期，那本书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印了不知多少万册，它为上海文艺出版社赚了不少钱——如果从市场经济的观点来说。而且跟着那本书搭车的那套丛书也赚了不少钱，那套丛书给他们上海文艺出版社“得分儿”了。那本书被好多人阅读、讨论，甚至和文学没关系的人——这也可能是一种传染性的现象吧，有些刚刚结婚的年轻人也要买一本《性格组合论》，说看看我们两个





性格怎么组合更好。当然这是一个误解，但是据说这是真事儿。这就是当时文学轰动、文学评论家也跟着受瞩目的一个例子。由此可见，当年的文学和文学研究、文学评论如何受宠。可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学评论、文学研究也同文学创作一样，不那么火了，逐渐式微了，文学创作家、文学研究家和文学批评家都走到了社会舞台的边缘。90年代之后谁最走红？是歌星啊，影星啊，还有球星啊。流行歌曲风靡一时，香港歌坛的“四大天王”几乎尽人皆知。在许多年轻人那里，经常挂在嘴边儿的是张曼玉、巩俐、张艺谋、陈凯歌，以及章子怡等四小明星，影迷们经常议论的是哪对儿影星“好了”、哪对儿影星“掰了”，影坛轶事，花边新闻，不胫而走。而球坛上，马拉多纳、齐达内、菲戈、罗纳尔多和小罗纳尔多、小贝以及小贝的“辣妹子”……几乎家喻户晓，齐达内比希拉克知名度高；对于许多球迷来说，英超、意甲，谁在第多少分钟被谁替下，谁在哪场球上演了“帽子戏法”，谁被出示黄牌儿下次不能上场，谁踢进一个乌龙球……，如数家珍。虽然咱们中国足球踢得不怎么样，但那些球星还是备受青睐。咱们那些球星老是不往人家球门里踢，不是高就是偏，总是踢不进去，活活急死人，屡战屡败，当然，也还不得不屡败屡战。即使这样，球星还是受瞩目。而文学创作家、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研究家，相对来说就被冷落到一边去了。

在我看来，这种边缘化可能是文学创作本身和文学研究本身的一种正常状态。因为文学这种东西，说白了，它不过就是文学而已。在某种时候，它有轰动效应，它受到瞩目，受到重视，作家被当作英雄，那是在特定情势下出现的一些特定现象。当这特定的情势已经过去，时过境迁、事过境迁，走入正常轨道，可能文学创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研究家就恢复到比较平和的、平常的状态。不是它“被边缘化”了，而是它大概找到了自己在社会当中的恰当位置，符合它本身地位的某种位置。我们这些吃文学饭的人，自己的心态要扭一扭、摆正当，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当然也不要完全不把自己当回事儿。太把自己当回事儿，把自己放到不适当的位置，肯定不适应变化了的情势，老是感觉不平：哎呀，想当年咱曾如何如何风光。就像阿Q说的，当年我们阔得多咧。现在，走背字儿了。老兄，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别光做美梦了，醒来吧。

但是，20世纪90年代即使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文学研究已经不像以前那么轰动了，在中国仍然没有出现“文学将要终结”这样一个命题。而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有一个令人吃惊的命题传到中国来：“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文学将要终结”。比较集中和明确地传达这个讯息的是美国著名学者J. 希利斯·米勒教授。2000年金秋，他在北京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了一个长篇发言，说全球化时代（或者说电信技术时





代、电子媒介时代)文学将要面临“终结”的“悲惨”命运。这引起了与会者不小震动和争论。这个发言后来以《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为题,发表在2001年第1期《文学评论》上。

说文学“终结”,根据何在

米勒所谓“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不是他的话,他是引用了德里达——法国的一个很有名的后现代哲学家、解构主义哲学家的话。德里达的话是怎么说的呢?是说,在电信技术王国时代,就是电子媒介时代(现在叫法不一样,还有的叫做第二媒介时代,另有叫做智能经济时代,等等,各种各样,大体上说的是一个东西),文学要走向终结。德里达在《明信片》这本书里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我不愿在这里给大家多念引文,免得大家打瞌睡。德里达、米勒的意思就是:文学(即使不是全部)走向终结了,文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且,不但是文学,连哲学、精神分析学都会走向终结,连情书也要被淘汰了。过去大家看《鲁迅全集》,知道鲁迅和许广平写了一本情书,叫《两地书》,大家很欣赏。而现在德里达斩钉截铁地说,再也不要写什么情书了——这世界再也不需要情书了,写情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米勒传达德里达的思想,并且赞成德里达“文学终结”的思想。他的根据是什么呢?

根据就是,在电信技术王国时代,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条件已经改变了,于是文学也相应地被改变,从而走向终结。

上面说的米勒发言的那个学术研讨会,鄙人有幸在场,亲耳听到了米勒的高论。米勒这位70多岁的外国老头儿很会讲话,有学问,又不失幽默。听他讲话,我的感受就是有点苏格拉底式的论辩味道。大家看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看《理想国》,知道苏格拉底在和人辩论的时候,总是引导他的对手跟着他走,然后给对手设些陷阱,对手跟着他走啊走啊,最后他一转,正好把对手引到他设定的陷阱边儿上,对手不得不接受他的结论,无可奈何地认输。米勒也学苏格拉底,而且当时米勒很会照顾中国听众的情绪。因为那个研讨会上在座的都是些吃文学饭的人,就像今天在座的都是中文系的博士生、硕士生,大部分人要以文学为今生今世从事的一项事业。想一想,如果文学“消亡”了(按:米勒他们说的是“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也就是西方许多学者通常说的“终结”,咱们